

特大危机管理中的政府防治与民间救援

朱国云

内容提要 由于自然界和社会的矛盾运动，社会有时会发生危机。对于威胁性较强、形势紧迫的社会特大危机，在政府防治能力有限、社会组织化程度较高的情况下，宜采用社会总动员的方式来抗击。在社会总动员的危机防治中，政府应利用自身的优势，发挥危机治理中救治的主导功能。同时，应充分重视民间救援的作用。

关键词 社会危机 政府管理 民间救援 社会动员 非典

从 2003 年年初一直到 6 月份，全世界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都先后遭受了 SARS 病毒的侵袭。中国的香港特区、大陆地区和台湾地区更是这场人类从未遇见过的灾难中的重灾区。在中国大陆地区，除四个省和自治区未发现“非典”疑似病人外，其他省份、自治区和直辖市都面对着 SARS 的袭击。这场危机并不是因社会矛盾、社会动乱所引发的，而是由人类从未遇到过的病毒传染招致的。无论从其影响的规模、程度，还是从社会和人民遭受的实际损失来衡量，这的确是由自然灾害所引发的特大自然型社会危机。^①

特大社会危机固然给社会和人民带来生命、财产和精神上的威胁、危害和损失，但是，这种社会危机也是对已有的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化程度、政府体制和能力的一次严峻考验和全面检验。透过危机，人们能够发现人本身的脆弱性、社会的脆弱性和政府的脆弱性。我们应当充分利用这次罕见的特大社会危机，总结经验教训，建立起有关危机分类、预防和治理的理论，形成行之有效的危机预警系统和危机应对、防治体系。

特大危机激发了许多学者的研究热情和责任。报刊、杂志上已有许多专论，最近，还出版了

以“SARS 危机与制度变革”为专题的论文集。这些论著大多从政府治道变革、政治问责、危机决策、公共卫生体系的改革等角度进行了研究。^② 本文主要从政府治理和民间救援两方面来思考如何增强预测、抗击和处理特大社会危机的能力。

社会总动员是应对特大危机的有效方式

社会宏观层面上发生的特大危机，特别是自然灾害引发的特大危机，单独依靠个人、某些专业群体，中央、地方和基层政府的力量去应对、防治是不能奏效的。从这次成功地全面抗击“非典”的过程来看，自然型特大社会危机必须采用社会总动员的方式，才能在最快的时间内，最有效地应对、预防和治理。有一些人在 SARS 危机过后认为，在“非典”危机期间，中国大陆地区，前后出现的疑似病人也就是 5000 多个，死于这种危机的人数也只有几百人。有时几座煤矿瓦斯爆炸，恶性循环性交通事故，死的人也好几百，犯得着实行社会总动员来抗击那么一种病毒吗？也有人认为，采用社会总动员的方式用的是计划经济模式中的思维方法和以往搞运动的老套路。种种讲法从表面上看似乎有点道理，但仔细研究起来是欠妥的。

无论是国内的媒体还是国外的舆论,都对中国政府成功地抗击由“非典”引发的社会危机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在这次特大的社会危机中,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的损失是有限的,经济发展所受的影响比外界原先的估计要小得多。正因为采取了社会总动员的方式,才使这种人类从未遇到过的、给人们生命造成严重威胁的病毒的突然流行所造成危机和恐慌在极短的时间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和救治,使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和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减小到最低限度。没有及时、果断的社会总动员,这次危机的破坏将是不堪设想。

虽然应对危机采取的社会总动员,在某些形式上,与计划经济模式下的行政命令、由上向下的控制、严格规定人们的行动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性。但是,这与计划经济的大搞群众运动完全是两码事。危机状态下的社会总动员是一种短期的、非常态的管理方式,计划经济下的搞运动则是经济性的、常态的管理方式;危机管理中的社会总动员是依据一定的法律规范进行的,计划经济下的大搞运动则是人治的表现。当然,并不排除在危机管理中采取社会总动员时,某些地区、某些政府部门、某些人员的具体做法上会带有计划经济模式的思维定势,这只是局部的现象。

群策群力,上下配合,实行社会总动员,这是抗击 SARS 危机的一条成功经验。当然,并不是任何一种社会危机都需要采用社会总动员的方式来应对和治理。对现实社会危机的防治是否要采用和能否采用社会总动员的方式,主要取决于三个方面的因素:一是人们面临的社会危机的特性,二是政府抗击社会危机的能力,三是社会组织化程度。

像中国这次抗击由“非典”所引发的社会特大危机,之所以采用社会总动员的方式来应对,也正是由于上述的三种因素决定的。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特大社会危机的特征。它基本上决定着人们对其防治的方式。特大社会危机具有突发性、巨大威胁性和应对的紧迫性等特征,会给整个社会带来巨大的恐慌、混乱甚至灾难。因此,抗击这类特大危机必须实行全社会总动员。

社会特大危机具有突发性。有一些自然型的

社会危机,如大面积的洪涝灾害,人们能够在事先掌握某些征兆,即使是震级较强的地震,也能借助于现代科技做出一定程度的预报,至少人们心理上有所准备。但是,像 SARS 这样的病毒,人类还未接触过,一旦出现,迅速传染,而现代临床医学又没有有效的方法和药物去帮助重患者脱离险境。当这种凭肉眼看不见的病毒到处蔓延时,一场突发性的社会危机就降临了。因为是突发的,完全出于意料之外,整个社会,包括政府都没有任何精神的和物质的准备。所以在“非典”从广东传染到首都,再从首都向其他省份蔓延时,各级政府都感到突如其来,不知如何应对。这时社会的总体动员就显得尤其重要。

社会特大危机具有紧迫性,所以要求社会和政府必须在最短时间内加以抗击和处理。如果说,一个大的自然灾害是突如其来的,但是,它对整个社会的危害却是逐步推进的,或者,人们已经有了一定的办法阻挡它的迅速蔓延,这种灾害引发的社会危机也许不会让社会和政府一时手足无措。像中国近几年几乎每年都有特大的洪涝,但是,洪水猖獗无情但有形,泛滥无边却有底。而像“非典”这样的传染性病毒所造成社会危机就不一样了,它显得尤其紧迫,不容人们有丝毫的延误,它要求社会快速行动起来,要求政府决策具有果断性,迫使决策者必须以有限的资源和信息为基础做出决策。虽然这可能会影响到政府决策的质量,但如果政府决策不果断,它将会带来更为消极的后果。在当今世界,政府管理复杂的国家和社会公共事物,经常会遇到一些非常事件,决策者应对各种危机具有敏锐的洞察力,恰当估计形势,快速应变,及时疏导,果断地依法处理,有效控制危机状态的区域,谨防事态扩大,制止危机状态蔓延。政府在防止自然灾害或其它灾害蔓延时,固然有较大作用,但政府的力量有限,必要时,就必须借助于全社会的动员。

社会特大危机具有极大的威胁性。危机通常和威胁、恐惧或逆境等词语相互通用。危机意味着个人或一群个体的危险处境,若不采取某些形式的补救行动,人们将失去某些东西,或者是工作、或者是财产,更为严重的是失去生命。危机就

意味着处在危机之中的人会遭受潜在的、负面的损失。这种威胁性既体现在现实方面,即人们的生命、财产这些可见的东西可能遭受毁灭;也体现在人们的精神上,因为害怕自己和亲人在某个不知道的时刻感染上病毒,从而失去一切,心理充满着恐惧,感觉到时时处处充满危险。有时,个体的恐惧会像传染病一样传染给周边的人,形成群体恐慌,乃至整个社会的恐慌。特别对于人们精神上的恐惧,必须通过社会的总动员来解决。

社会特大危机具有阶段性。要求社会和政府在处理危机时必须有大的力度。危机是由诸多因素交杂而成的,就像1997年下半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一样,其发展必然要经历几个阶段,在危机的每一发展阶段,决策者都必须维持和采取切实可行的目标和对策。虽然一场危机的最终解决取决于长期不懈的努力,但是,像由SARS病毒引发的特大社会危机,对其抗击和治理的最佳时机却是在起始阶段。据最近的研究成果,专家们认为,就个人来说,确定“非典”与流感的抗体测试的有效时间是在感染后的12~21天,超出这一时段,不仅测试困难,而且无法治愈。就整个社会对“非典”的防治来说,也是早期阶段比后期阶段容易。^③无论对个人,还是对于整个社会,要做到早防早治,这就需要全社会的发动。

对特大社会危机的防治要通过全社会的总动员不定期实施也是由现代政府资源的有限性决定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全部资源几乎都属于政府控制,政府管辖的范围也无限大,这是一种无限政府。在这种体制下,社会遭遇大的危机,其治理基本上由政府单独来承担。经过市场取向的改革以后,现代的政府已经被规定在公共领域活动,掌握的资源是有限的,加上处于转型期的政府,职能转变的任务还未完成,因此,政府对特大社会危机的预警、防治和处理能力不强。有许多学者责怪某些地方政府和政府部门在遇到SARS危机时惊慌失措,软弱无力,无能为力。平心而论,对于这样一种危机,就是西方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政府,在处理这种突如其来危机时,也有相同的表现。中国各级政府正处于转型时期,应对和处理危机的能力固然要相对小一点,但即使是功

能健全、职能到位的政府,也不可能有那么大的能力,单挑独斗地抗击危机,因而最终还是要依靠社会力量。

一国政府能否在危机治理中采用社会总动员的方式,还同这一社会的组织程度相关联。在西方的市场经济和民主社会中,社会高度分散,利益分化程度较高,加上意识形态多元化的影响,社会的组织化程度较低。在这样的社会中,政府即使想动员全社会应对危机,实际上也办不到。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其市场经济的发展是有序的,社会主义强调人民的主权地位,而且社会公众的行为都有基本相同的价值选择,这种社会的组织化程度就较高。在这种社会中,只要执政党号召,政府指导,社会公众就能令行禁止,产生出社会的强大合力。

社会总动员方式中的政府救治机制

面对由自然灾害侵扰,新的犯罪势力破坏,或恐怖力量侵袭所引发的社会特大危机,世界各国政府都在采取措施提升自身对危机的应急管理能力。美国是社会特大危机应急管理做得比较好的国家。联邦政府危机应急管理局(FEMA)负责制定应急管理政策,并为全国的应急管理设定全部的规范化的操作标准和指导纲要。虽然联邦和州政府在危机防治中加强与社会的非盈利部门、私营部门合作,建立全社会的应急管理系统,但美国在危机应急管理中还是强调联邦政府的统一指挥,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

虽然建立在市场体制基础之上的现代政府是有限政府,对社会干预的能力是有限的,但是,现代政府仍然掌握着公共财政、国家的各类基础设施,制定和实施公共政策等资源和手段,仍然能够对社会面临的特大危机进行抗击、防治和处理。从中国社会抗击因“非典”所引发的社会危机和美国政府处理因“9·11”恐怖袭击所导致的社会危机的经验来看,在对付特大社会危机的社会总动员中,政府的积极干预,由政府担负的危机防治是必不可少的。

在一定程度上,积极的、甚至带有强制性的干预,是政府发挥作用的有效方式。在危机过程中,

政府通过分析危机的起因、特征, 抓住那些足以影响和改变危机的关键性因素, 集中资源, 采取强化的干预措施(包括合法使用武力), 促使其朝良性方向发展。当然, 在强调积极干预的同时, 并不能否定在非原则和非重要性问题上克制和妥协的必要。

一般地说, 社会特大危机往往具有双重性。传统的危机理论认为, 危机与冲突是社会病态的现象, 它的出现证明社会有缺陷。但是, 现实的经验证明, 没有一个社会系统是完美无缺的, 冲突和危机是活生生的社会所不可避免的。冲突和危机固然对社会的运行会暂时起消极、阻碍的作用, 但是, 它也能促进社会的协调和整合。正是在这一意义上, 我们可以说, 危机不仅仅意味着危险, 而且还有转机、契机的含意。这正是危机的双重性。对于社会特大危机来说, 其双重性也特别显著。特大危机肯定会给社会造成巨大痛苦, 但是, 在特大危机的处理中, 政府也更加有为。只要政府想作为, 在危机情境下做出科学决策, 发挥抗击、防治、处理危机的积极主导作用, 遏制危机的消极作用, 并创造各种便利条件, 以便把消极转为积极, 变不利为有利。那么经过危机考验的社会将更为整合、更有活力。

在防治特大危机的社会总动员中, 政府所能做的是整合各种社会力量共同进行抵抗, 为实现非常时期的社会力量整合, 政府应当在下列方面发挥主导性作用:

首先, 建立全面的信息沟通机制, 并侧重于政府同社会的信息沟通。这种信息沟通应建立在一个透明的政府决策制度的基础之上, 让公众在最为恐惧、心理最为疑虑并且手脚最为慌乱的时候, 将政府的决心、决策的意图公开化, 让老百姓知情, 并与政府同舟共济。透明的决策机制, 至少应该给公众传递以下两点内容: 一是有关危机的发生情况, 如“非典”中, 政府每天都进行疫情通报, 准确的信息发布可以消除不负责任的小道消息。二是危机中政府所采取的举措, 以及为什么这样做, 这时的政府与公众之间是一种互相信任的关系, 政府应该相信公众的责任意识, 只有真正明白了政府的意图, 以及了解了事情的前因后果, 在此基础上公众采取配合的行动, 否则, 只能会是一种

抵触情绪。同时, 特大危机治理中的信息沟通必须是双向的。在危机状态下, 新闻媒体是政府与公众信息沟通的很好的中介。在政府传统的危机管理中, 新闻媒体只是单向的传递政府的行为, 而没有强调公众的要求。有时则相反, 只有公众的呼吁, 而不见政府的回应。现代政府在危机治理中, 应当注重信息沟通的双向性。

其次, 注重对公众心理的引导。在面临危机的情境下, 由于对未来的不确定, 对生命、财产的损失的担忧会构成巨大的心理压力。不少人有可能会失去理智, 精神崩溃。这时政府有责任对社会进行引导, 帮助公众消除心理上的恐惧和压力。恐惧感和心理压力, 除了来自于一种无知, 还来自于一种集体的群体性妄想症, 个人的恐惧在相互间的交流中, 会成倍的增长, 产生乘数效应。但是, 如果政府能够进行引导, 个人可以从集体中得到相应的安慰, 而不是相反。如在电台开通热线电话, 让人们在电话中发泄心中的恐惧感。也可以积极的宣传那些最值得尊敬的人, 让人性的力量战胜自己的懦弱。

在政府对公众的心理进行引导时, 重要的是能敢于承认自己的不足与不能解决的难题。危机是可怕的, 政府应该清醒认识到自己在危机面前的能力也是有限的, 进入危机时刻, 政府应该帮助人们加强自己的心理承受能力, 不是抱怨, 而是顽强的斗争, 从中找到人生的精神支柱。政府应借助于领导者个人的魅力, 增强人们的信心。

再次, 致力于公共资源的协调和集中。现代社会是一个开放的、多中心和分权的社会, 现代社会中的政府也是开放性的、资源和权力分散化的政府。这种权力和资源的相对分散化有利于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但是, 这在常态社会中是良好的制度设计, 到了危机时期就要适当变化。在特大危机威胁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发展时, 政府就必须集中权力和社会资源, 将能够利用的力量都使用出来, 以带领社会和人民度过暂时的难关。只有政府有这种合法性和权威去做这件事。集中权力和资源, 必须有统一的步伐和号令。政府在危机治理过程中, 为了保证权力和资源的迅速集中并加以使用, 所采取的方式可以是劝服

式的, 例如, 政府建议公众在“五一”期间, 尽量减少人员流动的机会。也可以是强制式的, 比如, 在洪水来临之前, 强制地对受灾地区采取管制, 迫使人们离开危险的地区。在“非典”发作期间, 选择重点地区强行隔离, 对重点地段实行强制性的检疫。

第三, 政府在危机治理中可以在全球性的合作方面发挥主导作用。随着人们的社会、经济生活联系日益紧密, 危机的发生, 影响已经超出了发生地的范围, 成为全球共同面临着的问题。在国际社会中, 针对一国的危机, 其他国家的反应, 有积极给予支持的, 例如, 在“非典”事件中, 韩国、印度、美国、德国都伸出援助之手, 也有些国家, 国际组织给予客观的批评, 还有一些国家进行恶意的攻击。在危机时期, 本国政府应该如何看待主权与国际社会义务之间的关系呢? 对于国际压力的承认是不是所谓的媚外呢? 就像刚才我们所讨论的一国之内公共安全与个人自由之间的冲突, 事实上, 在国际社会中也存在类似的问题, 当常态管理时期, 政府可以严格遵守相应的国际准则。例如在世界贸易组织中, 对于国际知识产权的遵守, 在世界环境保护中中国所允诺的责任, 这些说明, 一个国家在分享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时, 也必须承担相应的义务。在危机时期, 政府的所作所为, 更反应出一个国家对国际集体社会的责任意识。

一国政府在危机处理中, 应如何处理对外关系呢? 至少有两个问题值得重视。首先是, 信息的透明度。接受国际社会的监督, 而不是实行闭关锁国的封闭性政策, 对国外一切言论, 听而不闻, 信息的分享, 有利于其他国家给予相关的救援工作, 给予物资和技术上的资助, 特别是应该看到, 危机的管理经验本身就是一笔很好的财富, 中国在危机管理中应该借鉴他国的经验, 而不是独自探索解决之路。也许对一国陌生而复杂的问题, 对于另一个国家而言, 已经有相应的反应方式。第二是, 本国政府对他国人民的责任意识。在“非典”事件中, 香港政府要求每个出境的公民, 自测体温, 避免把病毒传染到其他国家。这项措施比安排外国病人在专门医院治疗更富有实际意义。危机发生的共享性, 使得危机的传播会越来

越多, 但是如果事发地的政府能够采取有效措施, 就可以避免危机的进一步的扩散。

社会总动员方式中的民间救援机制

在抗击特大社会危机的社会总动员中, 除政府主导性的防治外, 民间救援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危机应急管理是现代社会中政府必须担负的职能。但是, 伴随社会的急剧变革和全球化进程的加速, 社会遭遇的内部和外部的紧急事件和灾害事件有增多的倾向并出现恶性的趋势, 这些事件和灾害常常引发特大社会危机。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和尚不完善的市场体制下的政府, 缺乏足够的资源和能力来独立地完成对特大危机的应急管理任务。挖掘社会资源, 利用正在发育的社会组织, 形成政府与民间配合的社会应急管理体系已经势在必行。

中国是一个正在实行制度创新和体制转轨的、致力于推进全面小康建设、全方位地融入全球发展之中的国家。近几年来自然灾害频繁, 安全事故不断, 各种紧急事件屡屡发生, 加上国际上的恐怖势力、强权政治都对正在崛起的中国虎视眈眈。因此, 对中国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来说, 在发挥政府危机管理中的主导作用的同时, 充分发挥危机处理中社会总动员方式下民间救援机制势在必行。

民间救援在危机处理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一场特大的危机突然降临, 只凭政府的控制、协调是不够的, 缺乏社会力量特别是民间的参与是不可想像的。在危机管理中, 民间力量的组织和参与是必要的。民间力量的参与可以降低政府救治的成本, 但各种力量的参与应该是一种有序的状态。

经过 20 多年的改革、开放, 中国社会结构已经发生较大变化, 原先由政府单独承担的应急管理任务必须采取社会分担机制。在实际的社会紧急事件和灾害事件的处理中, 一些民间的组织起到更大的作用。但是, 这些民间的救援机构不仅分散, 而且没有一定的法规支持它们动员社会资源处理紧急事件, 也缺乏与政府必要配合机制。因此, 在详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以政府为主, 整

合民间力量,建立区域民间应急管理的救援中心,可以增强社会的应急管理能力和绩效。

建立区域民间应急管理的救援中心是一项政策性极强的工作。必须通过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逐步研究建立这种应急组织的条件,并设计其运行机制,才能保证这项工作稳步的发展。

第一,相对于政府的应急管理系统,建立政府与民间组织合作的社会应急管理体系的必要性。在计划经济体制和全能政府的条件下,政府包揽了对社会紧急事件和灾害事件的处理与管理。在动员型的社会中,这种民众参与的应急管理往往是无偿的,从而形成了政府组织、全民动员、封闭自守式的政府应急管理模式。在社会发生转型,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分化、政府资源缺乏,国内事务与国际事务相互渗透,而社会紧急事件、自然和社会灾害事件日益增多且日趋恶化的条件下,必须构建政府规划、官民合作、开放共守式的社会应急管理模式。

第二,在市场经济发达、民间组织功能强大、全球化程度较高的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社会中,已经建立起由联邦和各级政府制定一整套应急管理的法律和法规,政府的专门机构(在联邦是应急管理局 FEMA)负责制定出应急管理的规范化操作标准,各级政府提供应急培训和一定量的财政支持,同时又实行公私合伙,以区域为单位,建立官民协同的应急管理体系。研究西方国家建立社会应急管理体系的具体做法。

第三,研究和分析中国城市和农村两大社区以及不同区域民间已有的具有在紧急事件和灾害事件突发情况下进行救援功能的组织和机构。对这些社会组织和机构状况进行调查,探讨利用这些社会组织,并发展新的实施紧急管理的社会组织的可能性。

第四,研究以地理区划和经济、行政区划相结合,建立政府与民间组织相配合的区域民间紧急救援中心的条件,其中包括信息条件、人员条件、财政条件、医疗设备条件等。并探讨这类救援中心发挥应急管理功能的机制,其中包括政府与民间组织的配合机制、救援中心的组织结构机制、救援中心的紧急动员机制。

社会特大危机的抗击、治理,最终面临两个结果,一个是成功,一个是失败。防治特大危机的失败,首先是政府危机管理的失败,会对政府的合法性,提出相当大的挑战,所以政府危机管理成为政府自身的试金石,失败的结果不仅是本国人民的不信任,也是国际形象的一大损失,甚至于政府自身的存在都岌岌可危,而且社会的开放,把一些原本封闭的政府可以控制的铁桶予以打破,社会上的公众不可能会永远沉默,他们力量的爆发,会对政府形成重大的冲击,自然型的特大危机,就会转化为社会型的特大危机,而且会升级为总体社会危机。

我们不愿看到失败,我们希望的是成功的结 果。成功的危机防治,不仅是对政府也是对一个社会的考验。一次危机能让人们看清许多问题。政府和民间都能从危机中吸取教训,这些就能为以后的常态管理提供最好的经验。对于政府而言,可以切切实实做好包括公共卫生在内的公共事业,将政府尽快地转变为服务型政府,为民众服务,树立和改变自身形象。对于个人而言,每个人都要严于律己,都要自觉地承担作为个人对社会的责任,积极加入民间救援的行动行列。这种公共空间的扩展,把社会与政府紧紧拴在一起。今后再遭遇危机,就不仅是政府去面对,而是人人面对。通过应对特大社会危机的社会集体配合,人们将更加理智,政府也更加透明、开放。

①对危机类型的区分,学术界的看法并不一致。任何一个社会所面临的危机,只要对人们的生命、财产构成威胁,都是社会危机。从社会危机引发的原因来区分,有因洪涝、地震、海啸、飓风、病毒传染等自然灾害而引发的自然型社会危机,也有因战争、动乱而引发的社会型社会危机。若依据危机对人们生命、财产和社会发展的影响规模、威胁程度来区分,则有对社会局部产生影响、对人们生命、财产构成一定程度威胁的一般社会危机,也有对整个社会的全局产生剧烈影响,对人民的生命、财产构成极度威胁的特大社会危机。

②参见迟福林主编《警钟——中国:SARS 危机与制度变革》,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03 年版。

③参见《非典:疑虑与实情》,《参考消息》2003 年 8 月 19 日。

作者简介:朱国云,女,1951 年生,哲学博士,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责任编辑:陈如勇〕

ABSTRACTS

(1) Philosophical Critique on Value of Contemporary Living World

Yan Hui • 5•

The contemporary living world is of new structure and features, and is of more humane and terminate if to interpret from the viewpoint of value philosophy. The globalization directly pushed forward by market economy has made the life content be beyond economy and be of humane features, has kindled the value collision deeply rooted in life: the coexistence and conflict among simplicity and complexity, disenchantment and re-enchantment, construction and deconstruction has made the living world be of value duplicity. To look for the solution suitable to Chinese features is the theoretical mission as well as the practical requirement.

(2) Guide Civilization Dialogue and Thinking Collision in New Globalization Context

Ren Ping • 32•

New globalization and civilization dialogue forms the contemporary context of Marxism. To get rid of course barrier, actively deal with civilization collision and thinking dialogue in the time of new globalization, continuously activate and develop the truth of Marxism as the essence of the time spirit and the living soul of civilization, is pushing forward the innovation development of Marxism. The dialogue in nature is the thinking collision and solution based on the interactive practice in the time of new globalization, carried out between "time spirit" and "essence of time spirit", centered on the issues of new globalization.

(3) Target Location and Strategic Focus on Development of Yangtze River Delta

Zhang Haohan • 57•

To determine the target and strategic focus on future development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is a key problem to push forward the constant rapid development in this region, and to enhance its strategic func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should actively make full use of its economic and positional advantages to develop itself into the Chinese economic highland and the main increase pole, the advantageous and strong highland of Chinese manufacturing, the innovation base of the system as well as the institution, the highland of Chinese urbanization and the guiding region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To realize this target, the author has pointed out the strategic focus o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in Yangtze River Delta.

(4) On Informal System Restraint and Its Pattern in Development of POEs in Our Country

Jiang Fuxin Zhou Churping • 64•

In a social system structure, the system includes the formal system and the informal one. The effective conduct of the formal system needs the amendment and enlargement of the informal system. The informal system arrangement influenc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rivately-owned enterprises (POEs) mainly includes the lack of moral order,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the inertia of the planned institution, etc. the emphasis of the importance of the informal system does not mean "the theory of culture deciding everything". The pattern of the informal system arrangement may be constructed by ways of imitating and learning from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formal system arrangement.

(5) Governmental Prevention and Cure and Nongovernmental Aid in Management of Super Crisis

Zhu Guoyun • 88•

The crisis sometimes happens to the society because of the contradictory movement of the nature and the society. Against the destructive and urgent social super crisis, apply the social general motivation to fight, as the capa-

bility of governmental prevention and cure is limited while the extent of social organization is comparatively high. During the prevention and cure of the crisis with general motivation, the government should make use of its own advantages, play its guiding role in aid and cure. Meanwhile, pay full attention to the function of nongovernmental aid.

(6) Event of Social Crisis and Development and Mature of Third Department

Zhang Bin •97•

After a study of the third department booming greater and greater in our country, this paper has discusse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premises which influenc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hird department, respectively in two parts of objective states and social ideological states. In the premise of crisis, the social movement caused by the crisis event pushes forwar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hird department in our country in different aspects and to different extent. Besides, this paper has defined the mature of the third department organization proper as far as the extent of fund, decision-making independence and function perfection concerned. In the end, it has concluded after analysis that the event of social crisis is the golden chance to make the third department organization perfect.

(7) Law Sociology: Construction of History and Paradigm

Lu Yilong •112•

The sociology of law is a newly rising course and is booming in recent years. From the point of developmental history, there is a lot of difference in the study object, theoretical tendency and methodological principles, therefore, the indefiniteness of the course paradigm is self-evident. In order to promote this course, 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construct a regular study paradigm.

(8) Overall Construction of Well-off Society and Environment Law Innovation

Zhou Ke Wang Quandian Wu Guogang •118•

Eco-environment is an elementary problem that has to be dealt with in construction of modernization in our country. To take the constant development route is the inevitable option to achieve the target of being overall well-off; to build up the environment law-governing system oriented to constant development is the important support for being overall well-off; the ideology of constant development will greatly influence the elementary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he environment law governing; in the new situation of construction of well-off society, the environment law innovation is related to the legitimate basic principle, the renewing of adjustment ideology, reconstruction of legitimate system, basic countermeasures and the perfection of managing institution.

(9) Two Adjustments of Literature Approach: Boom and Separate Route of Anti-Japanese War Literature

Liu Zengjie •197•

The time of Anti-Japanese War was the time of catastrophe and pain; it was also the time to miss, to rouse, to contribute, to be vigorous; of course it was also superficial. We contributed our property and blood, even everything for that time, including literature. The two adjustments in literature current during the period made the Anti-Japanese War literature a shining poi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of 20th century.

(10) On View of Time and Space in Chinese and Western Arts

Yu Deshan •207•

The view of time and space is an important idea in the composi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arts. According to the narration, different narrative media show different features of "time" and "space". This paper starts with the change of "language - diagram", has discussed anew the "time and space" in the composi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arts, and has concluded that different philosophical bases decide the view of time and space in these arts as well as the different narrative aesthetic style.